

论“报”的中国文化背景—— 我国古代信息传播意义上的“保”、“报”关系考

赵尚

摘要

古代的“保”由最初的“负子于背”而引伸出保护、养育、教化等涵义，儒家伦理讲究有自上而下的“保”，相应地就有自下而上的报答之“报”。因此在宋代以前，信息传递意义上的“报”多用于自下而上的传递行为，这最终促成了我国最早的报纸——唐代进奏院状报的产生。宋代以后，官方的邸报之“报”，不再是与“保”相对的报答之“报”，而是具有教化意义的“保”性质的“报”。无论“保”还是“报”，都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伦理本位的反映，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家长制权威”性质的精神联系的一种体现。

关键词

保、报、邸报、宣传、家长制

作者简介

赵尚，博士研究生，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Email:shangxia78@163.com.

Discourse upon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Bao” (报, forth ton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o”(保, third tone) and “bao”(报, forth tone) in the sense of Chinese ancien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hang Zhao

Abstract

"Bao" (报, forth tone), a Chinese character naming for "newspaper", means paying back from the lower to the upper. Such an idea has originated from another character "bao" (保, third tone), which means protect from the upper to the lower. From the initial meaning of "bearing a child on the back", the ancient "bao" (保, third tone) has extended the meanings of protecting, rearing and civilizing etc. Confucian school's ethics stressed the "bao" (保, third tone) from the upper to the lower, and accordingly, the "bao" (报, forth tone) of paying back from the

lower to the upper came into being. So before Song Dynasty, "bao" (报, forth tone) in the sense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was mostly used to denote pass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lower to the upper, which facilitated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earliest newspaper of Jinzou Yuanzhuang in Tang Dynasty. Since Song Dynasty, the "bao" (报, forth tone) of official gazette did not means "paying back" opposite to "bao"(保, third tone) any more, but the "bao" (报, forth tone) with "bao"(保, third tone) nature which means "civilizing". Both "bao"(保, third tone) and "bao" (报, forth tone) are reflections of ethics of Chinese ancient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embodiment of mental association of "patriarchal authority", which is said by Karl Marx.

Keywords

"Bao"(保, third tone), "Bao"(报, forth tone), Propaganda, Patriarchy

对于我国古代的报纸,多数学者认为它产生于唐代,理由主要是不仅在唐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进奏院“状报”、“报状”或“报”等(方汉奇,1992)的记载与说法,而且还有保存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里的两份“敦煌进奏院状”实物为证。笔者同意这一观点,但笔者还想刨根问底的是,“报”字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为什么偏偏叫报纸而不叫其他的什么纸呢?“报”字是否反映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对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爬梳、考据,进而发现,古代信息传播意义上的“报”字,实际上与另外一个与之同音但不同声调的“保”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要了解“报”的来历,则需要先从“保”字入手。

宋代以前:因“保”而“上报”

关于“保”字,《说文解字注》认为:“保,养也。”(《说文解字注·卷八篇上》)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它最原始的涵义,“保”“是会意字……它本来的意思是背孩子,即把孩子放在背上并加以保护的形像。”(余佳,2010)正如唐兰先生在《殷墟文字记》中所说:“然则保本像负子于背之意,许君误以为形声,遂取养也之义当之耳。”(唐兰,1981)

既然“保”的最原始涵义是背孩子(与之相关的“褓”意思为包婴儿的被子),这就涉及到了两对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如“若保赤子”(《尚书·卷八》),以及孩子长大以后与父母之间的报答与被报答的关系(所谓“养儿防老”),因而“保”与“报”便构成了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先有上对下的“保”,后有下对上的“报”。儒家所讲的最主要的“报”至少有四

种：报天、报神、报君和报亲(覃江华,2013)，其中报亲就是长大后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报答与被报答的关系，而报天则可以说是一切“报”中最为根本的：“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礼记·卷八》）然后就是报神和报君。

先说报神。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尤其是周代以前），人们面对自身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力，遂产生了世间存在着控制自然力量、掌握自身祸福的神灵存在的观念，这些神灵可以是自己的祖先，也可以是其他与动物等有关的神，因而可以合称为神祖。就像孩子需要父母的保护一样，在自然面前倍感无力的人们也同样需要神祖的护佑，而祭祀便是人们祈求、报答神祖对自己护佑的一种途径，所以无论是“保”还是“报”，都与祭祀有关。就“保”来说，巫保、神保、灵保等都是对巫及祖先神灵的尊称(王琪,2012)，如“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属。”（《汉书·卷二十五上》）“先祖是皇，神保是飨。”（《诗·小雅·楚茨》）“鸣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楚辞·九歌·东君》）。就“报”来说，根据王国维先生的推断，甲骨文中的“𠂔”等字很可能就是后来的“报”，它的原意系由象征郊宗石室（指葬地祭地）而引伸为祭祀(杨联陞,2009)。祭祀一般都伴随有人与神祖之间的祈求、感谢、占卜等的信息交流，因而“报”不仅有报答的意思，也有信息传递的意思：《说文解字》对周代以后产生的“报”字的解释是“当罪人也”（《说文解字注·卷三篇上》），意思是承担与其罪行相应刑罚的人：“古时候有将犯人作为祭牲报告祖先的习俗。因此，‘报’的本义有判决罪人、报告、起解之意。”(王殿卿,马慧娟,2009)

再说报君。儒家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就是把君臣关系看作类似于父子关系一样。那么，既然父子之间有“保”与“报”的关系，那么君臣，包括推而广之的上下级之间也存在“保”与“报”的关系：1.上对下的“保”，如“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章句上》）“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善哉，保家之主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2.下对上的“报”，如“蕤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三国志·卷二十五魏书二十五》）“今年何以报君恩？”（《虞美人·扁舟三日秋塘路》）“君子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礼记·卷十四》）（此处的“其亲”指的是父母双

亲)因“保”与“报”的这种关系,所以自先秦时起,信息传递意义上的“报”就多用于自下而上的传递行为(直到今天仍然说“上报”),如《六韬·卷三》:

“将已受命,拜而报君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韩非子·卷十一》:“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还报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将后齐、燕。’”《庄子·南华真经卷第十》:“子贡还,报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圣人与!’”

既然君臣之间存在有“保”和“报”的关系,那么在实行皇帝集权的秦汉以后,臣下面向皇帝的信息传递被称为“报”就不足为奇了,其中比较常见的是与表示上行公文的“奏”字在一起连用,形成“奏报”或“报奏”,如《西汉会要·卷六十七方域四》:“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也。按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汉书·卷六十三》:“复遣中大夫至京师上书言:‘窃见……’奏报闻。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承前诸州饥馑,皆待奏报。”《续高僧传·卷十九》:“猛等报奏。下敕曰:‘朕欲为菩萨治化……’”《筠溪集·卷一》:“伏见州郡近年刑狱待报奏案例,皆稽滞近及半年……”因“保”和“报”的关系并不限于君臣之间,在父子、师生以及君臣以外的上下级之间也存在这种关系,所以当唐代出现了一种叫做“状”的上行公文时,隶属于各藩镇长官的京城进奏官们(他们之间也存在“保”与“报”的关系)发给他们藩镇长官的、作为上行公文的“进奏院状”也同样可以与“报”连用,叫做进奏院“状报”或“报状”。但是与“奏”比起来,臣下面向皇帝的“奏”是非常严肃和庄重的,一般都是与臣下或臣下所管辖范围内的工作事务有着直接关系,并且有很多还是需要立即应对或办理的,所以就“奏报”或“报奏”的组合来说,“奏”是必不可少的,而“报”却可有可无,因为“奏”本身即包含有上传信息的“报”的意思。但“状”却非如此。唐代进奏官发给自己的藩镇长官的上行公文叫做“进奏院状”,一来它没有面向皇帝的“奏”庄重和严肃,二来它所传报的内容“绝大多数属于朝廷的政事活动,和收阅者没有直接关联。”(方汉奇,1992)因而就显得不是十分要紧(相应地也就不是需要立即应对或办理的),因此,对其的称呼,不仅有“状”、“报状”或“状报”等(就像有“奏报”就有“报奏”一样),而且有单称为“报”的(方汉奇,1992),如李德裕在《论幽州事宜状》中曰:

“右,臣伏见报状,见幽州雄武军使张仲武已将兵马赴幽州。”(《全唐文·卷七百二》)而在《潞州事宜状》中则已单称为“报”了:“右,臣伏见报,兵马不肯发赴振武,闭城叫反。”(《全唐文·卷七百三》)杜牧《樊川集·卷十二》中

的《与人论谏书》亦云：“前数月见报，上披阅阁下谏疏，锡以币帛，辟左且远，莫知其故。”这反映了唐代的进奏院状传递信息的色彩已经超过了公文色彩：它“虽然还残留有某些官文书的痕迹，但已不同于官文书，反映了由官文书向早期官报转化的历史轨迹。”（方汉奇，1992）单独的“报”的称呼，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其由动词衍化出相应的名词的标志；也正是“报”这个独立的称呼，标志着我国古代报纸的最终诞生。

另外，“保”字由“保护”又引申出了保证、担保之义，如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保甲”制度。而“葆子”的意义就与保证、担保之“保”有关：“它大略相当于汉代和以后的‘任子’，即以子作保证，亦即‘质子’。所以，葆子、任子就是人质，但不限于子。”（杨联陞，2009）唐代的进奏院状报是我国最早的报纸，因而唐代的进奏官就带有最早的官方报纸记者的性质，而这些进奏官最开始就多是“葆子”即“质子”：“最初担任进奏官的，有不少是地方藩镇留在京都的质子。这是在藩镇力量的羽毛未丰，还需要取信于朝廷的时候。及至藩镇势力日渐扩张，派驻首都的进奏官也由质子换成亲信的将领。”（方汉奇，1992）

宋代以后：“保”性之“邸报”

相对于唐代进奏院状报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宋代的邸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但因历史的惯性使然，这种纸质的信息载体仍被称为“报”——邸报或曰朝报等，而此时的“报”作为名词化的信息载体，已不再有与“保”相对的自下而上的报答之“报”的意义了（当然，作为动词的、与“保”相对的自下而上的“奏报”或“报奏”之类的“报”依然存在）。那么，宋代的邸报之“报”与“保”之间还有关系吗？笔者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而这首先要从“保”所具有的两个层面上的涵义说起。

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基础，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农业社会里，作为生产关系之核心的土地所有制又是整个古代社会经济基础之“基础”，因而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便可以由土地所有制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来得到解释和说明。在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恩格斯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1973）而中国古代的情况就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一点为中国的皇权专制统治提供了根本性的必要前提。战国以前，对于神祖的崇拜、祭祀、祈求、占卜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占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所谓“国之大事，在

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不但宗族内的重要礼仪要在宗庙举行，政治上的重大典礼也都必须在宗庙举行……所有国家大事，国君都要到宗庙向祖先请示报告。”（杨宽,1993）而自战国时期开始，“由于社会经济的变革，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确立，朝廷的重要性开始超过宗庙，许多政治上的大典逐渐转移到朝廷上举行，并开始出现对国君‘大朝’的礼制。”（杨宽,1993）这标志着随着神祖之“保”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降低，国君之“保”的重要性却在日益提高。自秦代开始，皇帝已经独揽大权于一身，到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理论又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规定了皇权专制统治的合法性，至此，在实际上超越了神祖的、皇帝对天下吏民至高无上、无远弗届的“保”的地位、角色与权力已经形成，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中国）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马克思,恩格斯,1961）

神祖之“保”可分为两方面：物质方面在于确保人们生命的保全与物质生活的保障；而在精神方面，对神祖的崇拜心理与祭祀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增强人们之间的凝聚力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仪式”，对人们的精神具有培养、培植的教化作用，而这正是“保”字在古代所具有的涵义之一。“保”由最初的“负子于背”而引伸为“养”：“保，养也。”（《说文解字注·卷八篇上》）因而古代不仅有养护身体的“保”官：“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大戴礼记·卷第三》）而且有在思想上进行“养”——即负责辅助、教化、教育的“保”官，如“太保”等：“男性之保，来负责王室贵族子女的教育，乃至辅助君王的政权。”（余佳,2010）如“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尚书·卷十》）“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礼记通解·卷七》）可见“保”有一定的培养、培植的意思，像历史上被尊称为“亚父”的范增、被称作“仲父”的管仲以及被称作“相父”的诸葛亮等，在一定意义上对他们的主子而言都具有这种辅助以及培植、培养的“保”的作用。

马克思当年在论及中国时曾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1961）皇帝是全国的君父，而那些太子或皇帝身边“保”官的职责就是培养太子或皇帝身为全国君父的应有素质，并培植他们在朝野的权力与威望等；同样，各级官吏身为皇权在他管辖地区内的代表，同样需要具备相应的忠君爱国、为民表率等方面的精神与素质，因而与之相应的培养和培植也一样的必不可少——正如宋太宗所言：“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五代时期成德节度使史安重荣所说的“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五

代史·卷五十一》)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种培养和培植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那么,具体应该如何培养和培植呢?这就涉及到了皇帝之“保”的问题,它同样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物质上同样是为官吏们提供生命保全和物质保障,如《三国演义》中许多官员在说起要报效朝廷、尽忠汉室的理由时,主要就是“久食汉禄”或“世食汉禄”;而精神之“保”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等人才选拔制度——可以督促知识分子们主动地培植自身为适应皇权专制统治而必备的儒家文化修养,秦代开始的作为国家重要仪式的“大朝会”制度(地方官员在每年岁首这一天集体朝见皇帝的盛大仪式)——对地方官员是一种“仪式性”的教化,以及从宋代开始出现的官方邸报,等等。宋代邸报的内容虽然属于新闻的范畴,但与同时期的小报比起来,一是内容不够全面——因“定本制度”的实施而遮蔽了许多不利于皇帝及当权派官僚的信息;二是发行的速度比较慢,因而新闻的时效性不够强:“逐时虽有朝报,或报或不报,虽报或已过时。”(《宋会要辑稿·仪制七》)加之它把皇帝的诏旨和起居放在首位,因而相对于新闻性强的的小报来说,官方邸报带有较强的宣传性:“定本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加强了当局对邸报的控制,迫使进奏官们只能按照当局允许发布的内容进行传报活动,使邸报能够更好地贯彻皇帝和当权派宰辅的宣传意图。”(方汉奇,1992)那么,宣传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呢?这又需要从宣传的词源说起。

“现代汉语中的‘宣传’是外来词,与古代的‘宣传’概念无直接关系。”(刘海龙,2011)而英语中表示宣传的“propaganda”一词则来自于拉丁文,有学者认为它原有“植物的嫁接和移植”之义(陈力丹,1993),也有学者认为它原本有“播种、繁殖”之义(刘海龙,2011),笔者以为,在中国的语境下,对之还可以有更为准确的本土化释义。通过在线词源字典(www.etymonline.com)中对“propaganda”的检索可以发现,它的词义来源于“propagation”一词,而“propagation”的词源则存在于去掉前缀“pro”和后缀“ation”的“pag”当中,而“pag”又来源于单词“pact”,“pact”意为“条约、公约”,而其原始的涵义则是在线词源字典所解释的“to fasten”即“系牢,使合在一起,使坚固或稳固”等意思,这基本符合“嫁接”的原理,因为嫁接就是使两个植物的伤面形成层靠近并“紧扎”在一起,最终使之成长为一个新的个体。但嫁接毕竟是一个对植物进行整体性改变的培植过程,正像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对正常的人性也是一种整体性改变的禁锢性培养一样,而宣传一词一开始就是用于宗教信仰的宣传:

“宣传(propaganda)一词源于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或称信仰传播圣会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Faith)。”(赛佛林,坦卡德,2000)所以笔者认为,宣传(最早的宗教信仰宣传意义上)的原义之所以有“嫁接、移植”的意思,正是由于二者在“整体性改变”性的培植、培养意义上有相同之处。因宗教宣传的非科学性,所以宣传在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赛佛林,坦卡德 2000)。但当“宣传”一词来到了中国的语境下,则变成了一个中性词,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把“培养、培植”解释为“宣传”的原始涵义比较符合中国的语境,理由主要有三点:1.宣传一词的词源“pact”的原始涵义为“系牢,使合在一起,使坚固或稳固”,而《现代汉语词典》对“培”的解释为“为保护植物或堤、墙等,在根基部分堆上土”,二者都带有“保护,使坚固或稳固”的意思;2.“嫁接、移植”带有“整体性改变”的培养、培植之义,总体上属于培养、培植的一种,但宣传除了包括“整体性改变”的培养、培植外,还包括其他非“整体性改变”的培养、培植;3.宣传在中国是中性词,而培养、培植也是中性词,如“培植自己的势力”,这里的“培植”既可能是褒义,也可能是贬义,还可能并无褒贬的感情色彩。既然“培养、培植”可以作为“宣传”一词在中国语境下的释义,那么都带有培养、培植意思的“保”与宣传就在一定程度上意思相通了,因此说,以宣传性为主要特征的宋代官方邸报之“报”,就具有“培养、培植”的“保”的性质:“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海陵集·卷三》)

从宋代邸报的内容来看,它也的确带有教化的性质:居首的皇帝诏旨和皇帝起居的内容是为了在官员士大夫们的头脑中树立起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官吏的任免、刑罚以及法令条例等内容是为了对官员士大夫们形成激励或规训的效果:“进奏院逐旬发外州军报状,盖朝廷之意,欲以迁授降黜示赏功罚罪,勉励天下之为吏者。”(《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臣僚的章奏和战报等内容是为了在官员士大夫们中间强化大宋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意识以及有助于相互交流工作经验,如士大夫陆佃曾曰:“伏观进奏院报,泾原路城西安州毕功者……寰宇称庆。”(《陶山集·卷八》)而负面的灾异等信息一般禁止在上面刊登的原因就在于它可能会起到与教化相反的效果:“将灾异之事悉报于天下,奸人、赃吏、游手、凶徒喜有所闻,转相煽惑,遂生观望,京东逆党未必不由此而起狂妄之谋。”(《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从实际效果来看,邸报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教化效果,如士大夫周彦质“阅邸报,见士大夫触法抵罪,则喟然动容,为之叹息。”(《鸿庆居士集·卷三十六墓志铭》)邸报对士大夫们从反面发挥的警示作用可见一斑。而邸报

从正面对士大夫们发挥教化作用的证明就更多了,如陆游的《观邸报感怀》:“六圣涵濡寿域民,老年肝胆尚轮囷……却看长剑空三叹,上蔡临淮奏捷频。”(《剑南诗稿·卷六十七》)郭正祥的《邸报》:“边塞疮痍后,朝廷气槩中。不才思献赋,天路恐难通。”(《青山集·卷第二十一》)王迈的《二月阅邸报》:“书生忧愤空白头,自有经纶社稷臣。”(《臞轩集·卷十四近体》)这些诗作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士大夫们在阅读邸报的过程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忠君爱国之情油然而生。余英时先生认为,“以天下为己任”之所以能用来概括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征,“与士大夫们在当时权力中的客观位置有密切的关系。用现代观念来说,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迟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的肩上。”(余英时,2004)而专门面向官员士大夫们、在上面能看到自己与同行信息的邸报无疑培植了他们对自身在当时“权力中的客观位置”的认知与认同,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他们的忠君爱国之情。

通过中西对比我们还可以发现,邸报之“保”与西方的“宣传”一词虽然都有培养、培植的意思,但中国古代的邸报“保”的是皇权至上、忠君爱国等政治意识形态,而西方最早的“宣传”一词宣传的是宗教信仰,但二者又都带有“仪式”的性质:“如果说,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信息;那么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凯瑞,2005)西方的宗教信仰毫无疑问带有“仪式”的性质,而官员们定期阅读邸报上的内容,实际上也多少带有一些在想象中与皇帝以及文武百官们一起经历“上早朝”这个高度仪式化活动的意味:早朝是定期的,而阅读邸报也是定期的;皇帝的诏旨和起居放在邸报内容的首位,正像在“早朝”这个空间里皇帝是位居首位的一样;上早朝的官员们可以天天朝见皇帝,阅读邸报的官员们也可以通过阅读邸报上皇帝的诏旨、起居等在想象中“朝见”皇帝;早朝里的诏旨以及商议的章奏、刑罚与官吏任免等事项,很多都在早朝过后的邸报上得到了反映,因此说官员们阅读邸报的行为也带有一定的仪式化传播的性质,如“今月八日得进奏院状报,圣体康复,已于二月二十三日御延和殿,亲见群臣者。”(《景文集·卷三十六》)相应地,这种仪式化的传播能够培养和维系士大夫们对皇帝的仪式性情感,如宋人姜特立的《邸报改元得雪》一诗:“天意阴晴冻未分,忽惊碧璐散纷纭。梅花露白难夸客,麦本藏青预策勋。野水断流鱼入簠,江云垂地雁迷群。太平天子新鸿号,感召端由叶气熏。”诗人在邸报上得知“改元”(皇帝改换年号)这一重大的政治消息时,立即就感到眼前喜庆的瑞雪似乎与浩荡的皇恩有着某种感应

的关系；而士大夫史浩在邸报上读到“陛下降罪己之诏”的消息时，曾经“伏读流涕”（《鄮峰真隐漫录·卷第八》）。

宋代以后，除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元代以外，明清的官方邸报与宋代的相比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都属于带有教化意义的“保”性质的“报”。当然，除了这种名词化的邸报之“报”外，作为动词的、自下而上的“奏报”或“报奏”之类的、与“保”相对的“报”在宋代及宋代以后也同样存在，二者并行不悖。

结语

我国古代整体上是一种大陆文明或曰农业文明，与西方的海洋文明或曰商业文明不同的是，由于安土重迁、重农抑商、社会流动性较小，为了确保和谐的社会秩序，作为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之正统的儒家非常重视伦理观念，这就产生了“保”与“报”的关系与观念。无论是宋代以前相反相成的“保”和“报”，还是宋代以后具有“保”性质的“报”，体现的主要是自上至下或自下至上的、垂直方向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符合农业文明的伦理本位特征：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除了最后一项“朋友有信”是关于水平方向上的人际关系，前四项都是关于垂直方向上的人际关系；宋代的邸报除了报道位居最高位的皇帝的活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报道的是官吏的任免这种主要是垂直方向上的人员流动。马克思曾说过：“家长制权威”是（古代中国）“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马克思，恩格斯，1961）而作为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的“报”和自上而下的具有“保”性质的邸报，就正是这种具有“家长制权威”性质的精神联系的一种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宗教神学统治的黑暗中世纪以外，整体作为海洋文明的西方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作为商业文明，特征不是垂直方向上的伦理本位，而是水平方向上的商业本位，而这也容易带来相应的民主与平等。从西方最初的报纸形态来看，古罗马《每日纪闻》的目的既不是自上而下的“保”，也不是自下而上的“报”，而是身为民主派首领的恺撒为了“争取舆论支持，扩大政治影响”（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2000），表现出了一定的水平方向上的民主色彩；16世纪的威尼斯小报不仅报道的主要是商品行情、船期和交通信息等与商品经济有关的没有等级色彩的信息，甚至当时的铜币名称“Gazette”还被用来作为这种手抄小报的名称，而铜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为人们带来平等的潜力和色彩。因此，无论是“保”

还是“报”，都倾向于伦理本位上的保守，也都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家长制权威”的特点。这种特点的“精神联系”，固然有助于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稳定，但也容易使人闭目塞听、固步自封甚至夜郎自大，因为在意识形态上被神化的皇帝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在被马克思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带着嘲讽的口吻称之为“完善的报刊”之“原型”的中国邸报(马克思,恩格斯,1956)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根本看不到对异族或外国长处、优势的了解、介绍与借鉴，对于来自民间的疾苦与外部的威胁也缺乏足够的预警，因此，拥有邸报的宋、明、清三代，没有因为地方势力分裂而灭亡，但却无一例外地因外族入侵与农民起义而倾覆或被削弱，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映了这种“保”与“报”的“家长制权威”性质的精神联系消极性的一面。

(责任编辑: 方惠)

引用文献 [Reference]

陈力丹(1993).《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开明出版社.

[Chen, Lidan(1993).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Marx and Engels' Ideas on Communication*. Beijing: Kaiming Press.]

方汉奇(编)(1992).《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ang, Hanqi(Ed)(1992).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China (Vol.1)*.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刘海龙(2011).汉语中“宣传”概念的起源与意义变迁.《国际新闻界》,(11),103-107.

[Liu, Hailong(2011). The Origin and Changing Meaning of “Xuanchuan”.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1), 103-107.]

马克思,恩格斯(19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 & Engels, F. (1956).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 Engels(Vol.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马克思,恩格斯(19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 & Engels, F. (1961).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 Engels(Vol.9)*.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马克思,恩格斯(19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 & Engels F. (1973).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 Engels(Vol.28)*.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覃江华(2013).儒家早期“报”的思想释解.《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8),143-149.

[Tan, Jianghua(2013). Interpretation of Bao in Early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8), 143-149.]

唐兰(1981).《殷墟文字记》.北京:中华书局.

- [Tang, Lan(1981). *Characters' Record of Yin Dynasty Rui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王殿卿,马慧娟(2009).“报”义考辨.《新闻爱好者》,(6),43.
- [Wang, Dianqing & Ma, huijuan(2009). Textual research on Significance of “Bao” . *Journalism Lover*, (6),43.]
- 王琪(2012).“保”与巫术文化.《咸阳师范学院学报》,(1),60-62.
- [Wang, Qi(2012). “Bao” and Witchcraft Culture. *Journal of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1), 60-62.]
-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 (2000).《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7年).
- [Severin, W.J. & Tankard, J.W. (2000). *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 (Tran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7).]
- 杨宽(1993).《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Yang, Kuan(1993). *Study on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of Capital System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杨联陞(2009).《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 [Yang, Liansheng(2009). *Significance of “Bao” (Forth Tone), “Bao” (Third Tone) and “Bao” (First Tone) in Chinese Culture*.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余佳(2010).释“保”.《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6),37-38.
- [Yu, Jia(2010). Explanation of “Bao” . *Youth Writers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Art Edition)*, (6), 37-38.]
- 余英时(2004).《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 [Yu, Yingshi(2004). *The Historical World of Zhu, Xi: Study on Political Culture of Scholar-bureaucrats in Song Dynast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詹姆斯·W·凯瑞 (2005).《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89年).
- [Carey, J. W. (2005).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Tran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9).]
- 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2000).《外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Zheng, Chaoran & Cheng, Manli & Wang, Taixuan (2000). *The History of Foreig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